

DOI: 10.19411/j.cnki.1007-7030.2025.03.006

特朗普的政策回归与全球经贸秩序重构： 基于新孤立主义视角

徐超¹，李天国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信息情报研究院，北京 10073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摘要：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以“美国优先”为核心价值，呈现出选择性战略收缩与“新孤立主义”取向。特朗普政府正通过重构对外经贸战略框架，实施外资审查机制强化和产业回流激励等政策组合，形成具有显著经济民族主义特征的制度性安排。面对特朗普的政策回归，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通过加强经济体系韧性，提升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对接高标准经贸国际规则，增强规则适应能力与制度话语权建设；打破供应链关键环节的单一依赖，构建弹性供应链体系；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改革，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的全球经贸新秩序。

关键词：特朗普；新孤立主义；全球经贸秩序；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25)03-0055-09

一、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的缘起与演变

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可以追溯到立国初期，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塑造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身份。这一政策源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建国理念和历史经验，并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随着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等竞选口号，不少人开始将这些主张与孤立主义联系起来。然而，若“美国优先”与孤立主义有某种关联，那么，孤立主义是否真的能够使美国再次伟大，仍然需要深入分析和探讨。

美国是否采取孤立主义，取决于成本与收益权衡。孤立主义是指本国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过程中应遵循“本国优先”，回避参与或被卷入他们的军事和政治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朝鲜经济发展趋势与中朝经济合作研究”(22JJD79007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网络空间政策法规的翻译、研究与数据库建设”(20&ZD179)”

作者简介：徐超，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天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纠纷，避免承担更多国际义务。^① 换言之，本国是否参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事务，关键点在于其是否提升本国的政治影响和地位，使之获得相关国际事务的决策话语权，因而孤立主义并不是本国对外与世隔绝，而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孤立主义在美国不但不是贬义词，而且是美国的开国方针。1796年9月17日，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离任时发表“告别演说”，在阐述美国对外政策时，他强调在扩张对外商业关系时，应避免发生政治牵连；欧洲本身有一系列的重大利益，这些利益对于美国完全没有或只有很少关系。^② 简而言之，欧洲经常发生纠纷，在本质上与美国没有什么关系。华盛顿的这一演说被视为美国孤立主义的基本纲领，被此后历届美国政府所遵循，只是践行孤立主义的程度不同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的霸主。这要求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使美国从孤立主义走上全球主义和干涉主义道路。但在美国国内，时常因国内外形势变化，引发关于对外政策的辩论。一般来说，发起辩论的人，主要是要求美国回归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这被称为“新孤立主义”。截至目前，影响较大的新孤立主义思潮，大致有三次。第一次新孤立主义思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美国如何与苏联开展外交关系而展开激烈辩论。以参议员塔夫脱为代表的一方，要求美国回到孤立主义政策，被主张遏制苏联扩张的杜鲁门主义击败。第二次新孤立主义思潮，发生于越南战争期间，国内反战情绪高涨。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等为代表的一批人主张美国调整海外军事规模，撤出驻越美军，实施战略收缩。尼克松出任总统之后在基辛格协助下，制定出一套新的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即所谓“尼克松主义”，其中虽然有某些孤立主义的元素，但总体上仍然是世界主义的思想。第三次新孤立主义思潮，发生在冷战期结束后，代表人物是1992年与老布什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布坎南等人。他们认为冷战结束标志美国承担诸多国际义务的时代也应结束，要回到“应有的位置”上来，主张集中精力搞好国内问题，减少海外政治和军事义务。布坎南更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赢得了不少人的响应和支持，被舆论称作“布坎南现象”。不过，当时全球化盛宴正酣，布坎南没能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更没有机会当选总统，推行“新孤立主义”。^③

目前，特朗普重回白宫后，积极推行“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政策，借助19世纪的关税保护手段重振美国制造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国际机制和组织，让盟国分担更多军事支出，不愿再承担诸多国际义务。^④ 这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就已付诸行动，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可能会进一步延续，但并非要回归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孤立主义，而是要调整以往美国介入世界的方式，大量压缩美国的国

①孙成昊：《“交易式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路径》，《世界知识》2024年第16期，第16—17页。

②杜娟：《美国区域认同的历史演变》，《东亚评论》2023年第2期，第77—119页。

③安高乐：《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从新孤立主义向国际主义的回摆》，《南亚东南亚研究》2022年第3期，第20—36、152—153页。

④刘元玲：《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评析》，《当代世界》2019年第12期，第64—70页。

际义务，以最低的成本和代价维持和提升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二、美国“新孤立主义”复兴的再审视

2024年美国大选的结果证实了2016年特朗普获胜并不是反常现象。对于特朗普提出的政策主张，巴里·波森解读为，美国不想再受规则约束、可以毫不羞耻地追逐自身利益，不再被华盛顿政治建制派以及想要搭便车的国际盟友和客户所宰割。^①

（一）经济保护主义与“美国优先”战略的延续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观察，经济保护主义与孤立主义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光谱中的重要选项。早在1888年，恩格斯就指出美国的“保护关税制度已经为合众国尽到了力，它得到取消的通知越早，对一切人就越好”^②。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奠定的“不卷入欧洲事务”原则，在特朗普政策中被重新诠释为“美国优先”的现代版本。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指出，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并非简单历史重复，而是全球化背景下霸权国家应对相对衰落的策略性调整。当美国GDP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2000年的30.4%降至2023年的26.11%，政客们便开始寻求战略收缩以维持霸权存续。经济维度上，美国就业报告数据显示，1980—202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37%，实际工资中位数停滞增长，催生了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美国锈带地区选民将产业空心化归咎于“不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这为特朗普推行关税战、产业回流政策提供了社会基础。

（二）政治生态的民粹化转向

202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超过80%的美国人认为民选官员不在乎民众的想法，只有4%的美国人认为当今的美国政治体系运行良好或非常好。79%的受访民众使用“分裂的”“腐败的”“差劲的”“混乱的”“极化的”等负面词汇来评价当前的美国社会。^③传统政党认同弱化造就了民粹领袖的生存空间。特朗普通过构建二元对抗式叙事，成功将孤立主义包装成反抗“不合理”的全球经贸秩序的工具。这种话语策略在2024年选举中尤其奏效，使其在拉美裔选民中的支持率较2020年提升13个百分点。^④特朗普团队将“战略自主”概念极端化，形成具有排他性的经济安全观。这种观念体现在对贸易伙伴加征高关税、退出国际机构等具体政策中，实质上构成“选择性孤立主义”——在保持军事存在的同时，缩减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全球参与。

①“‘Will Trump Withdraw US From NATO? What Analysts Said’ SSP’s Barry Posen Responds”，2024年11月6日，<https://ssp.mit.edu/news/2024/will-trump-withdraw-us-from-nato-what-analysts-said-ssps-barry-posen-responds>，2025年2月10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6页。

③王文：《特朗普执政2.0会让美国更极化》，《当代世界》2024年第11期，第76—77页。

④《美国大选落幕之后》，2024年11月8日，https://m.gmw.cn/2024-11/08/content_1303891759.htm，2025年1月9日。

（三）社会文化心理的催化作用

2008年之后，美国社会出现“本土性焦虑”，表现为对移民人数占美国总人口突破15%的担忧、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抵触等。本土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模糊或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案，以解决诸如“全球化的弊病、福利国家的僵化、根深蒂固的党派之争、民主赤字、文化战争、失常、冷漠，以及自由主义本身的失败”^①等问题。根据2023年底到2024年初的各路民调，美国民众普遍将边境管控移民问题与经济通胀一同视为当前美国面对的两个最大问题，这种集体心理为孤立主义提供了文化温床。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202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52%的美国人对联国持有积极看法，相较于2023年的57%有所下降。这表明，尽管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联合国，但对其的信任和支持在过去的一年中减弱。^②这种制度性怀疑与特朗普的“退出外交”形成共振。这种现象实际上归因于“后真相时代的信息茧房效应”，社交媒体算法助推的反全球化叙事，使孤立主义获得超越传统意识形态区隔的传播力。

三、“新孤立主义”冲击下的全球经贸秩序重构

在“新孤立主义”引领下，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导向实为一种保守主义的复归。尽管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均将中国视为重要对手，但其战略实施方式上有明显不同。拜登政府更倾向于使用价值观外交手段，而特朗普政府更侧重于通过“新孤立主义”行为在经贸领域对华进行遏制。^③美国对全球治理的整体立场正从所谓“规则”“责任”“合作”转变为“利益”“实力”“竞争”。^④

（一）美国摒弃“华盛顿共识”，欲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新型全球化

当前的全球经贸秩序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高度绑定，至今仍是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主要制度载体。当然，以“华盛顿共识”为理念的经济全球化迎合了美国所遵循的发展理念：强调市场的作用，发展开放经济，并且倡导自由贸易。这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使华尔街金融资本获取较多全球化红利，但也为美国埋下“脱实向虚”和“贫富差距加大”等诸多社会经济问题，诱发“新孤立主义”兴起。特朗普政府推行“新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已从事实上否定美国长期奉行的经济全球化政策，无疑将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力、理论支撑和利益分配等方面带来变化。^⑤或者说，特朗普政府寻求的是一种“再全球

① Trevor Latimer, *Small Isn't Beautiful: The Case against Localis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23, p. 7.

② Janell Fetterolf, "Fewer Americans View the United Nations Favorably than in 2023", Pew Research Center, 2024, p. 2.

③ 盛斌、靳晨鑫：《“特朗普主义”贸易行为与中美经贸关系》，《国际贸易问题》2025年第1期，第19—33页。

④ 王明国：《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全球治理主张及其多重影响》，《国际展望》2025年第2期，第25—48页。

⑤ 宋国友：《美国孤立主义新发展及其对全球化的影响》，《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6期，第24—31页。

化”，即构建符合美国利益的新型全球化。^① 一是美国不再为全球化提供“公共物品”，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全球化进程中完全代替美国扮演的角色，比如美元霸权地位和科技霸权地位在短期内尚难以被取代。二是美国不断推出“去全球化”的政策。严格来说，他的“去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另一种利益、另一种力量、另一种话语及另一种模式；逆全球化浪潮的形成可以理解为，不同力量之间的利益竞合、权力竞合与话语竞合的结果。^② 三是美国不再强调全球化带来的共同发展，而是提出区分不同国家获得的不同收益，并主张打破原有所谓“不公平”的收益分配格局，重新定义全球收益分配格局。因此，特朗普重返白宫，未来很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甚至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全球化前景更加黯淡，并充满不确定性，至少影响全球化的深化与调整。

（二）以单边或双边主义冲击多边主义

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体系、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以及由主权国家参与制订的公约、协定和文件大多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形成的，但在美国“新孤立主义”的影响下，现有多边主义受到冲击。美国根据自己的利益标准，频繁退出其主导构建的多边国家组织。2018年5月，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美国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巴勒斯坦国为由，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不打算承担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碳氢能源进口国对世界承担的节能减排责任，再次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气候协定》等。美国的“新孤立主义”深刻地触动了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秩序。这已经远远超过中美关系的层面，而且会成为区域秩序和全球秩序发生“大变局”的主要根源。特朗普重回白宫，为了兑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选举承诺，他根本不在乎美国在国际机构中的职责、义务和盟友契约。这正在让传统盟友与美国的关系变得不再简单和稳定，美国与盟友从合作变成时而协作，时而对抗。当然，美国践行“新孤立主义”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彻底从全球事务中抽身，关乎美国利益最大化和核心利益的国际事务，美国仍然会全力以赴地参与其中。

（三）以“对等关税”名义扰乱国际贸易规则

美国从自由贸易政策转向所谓的“公平贸易”政策，要求对美国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单方面承担贸易平衡的义务。美国通过广泛提升关税，扰乱既有的贸易规范，引发全球贸易伙伴的紧张情绪。特朗普政府升级对华“贸易战”，不仅加征高关税，还威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实际上，对经济全球化或自由贸易的负面认知并非特朗普的个人偏好，而是多数美国人的认知。皮尤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在影响美国就业的因素中，外包和进口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两个有害因素。^③ 特朗普政府显然认为，与更加有序的体系相比，有利的不对称双边关系将为其带来更多利益。

①李向阳：《特朗普政府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2期，第44—56页。

②储昭根：《当前西方的反全球化浪潮：成因及未来走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3期，第20—30页。

③李向阳：《特朗普经济政策评估》，《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4期，第56—65页。

美国从多边机制转向双边机制的重要驱动因素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衰落，而这一变化削弱了其在全球事务的话语权与决策权。但是美国面对单个国家谈判时，还可以将其国家优势发挥至最大，并在利益博弈中占据主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是自美国崛起后首次面对的一个新格局。在单边主义成为美国新时期贸易政策的基本导向的情况下，美国将在区域和多边谈判中越来越多地运用双边机制。

（四）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

在战略定位层面，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其政策设计突破传统经贸摩擦范畴，转向对全球生产网络主导权的争夺。通过将国家安全概念泛化至供应链安全、技术标准、数据流动等领域，美国试图构建新型全球经贸治理框架。这种逻辑延伸出双重遏制路径：一方面以关税为杠杆强行切割中美产业关联度，迫使跨国资本重新布局；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封锁和投资审查，阻断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通道。这种设计本质上是要将经济全球化引向“阵营化”轨道，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闭环体系。

美国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向企业施加非对称成本压力，倒逼企业进行供应链替代选择，同时利用这种撤离效应，削弱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节点地位。在此过程中，美国刻意强化经济政策与地缘政治的联动性，例如将贸易谈判与地区安全议题捆绑，迫使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做出排他性选择。这种策略不仅改变传统经贸博弈的规则，更将经济手段转化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

特朗普政策体系内部存在多重结构性矛盾：一是产业回流目标与跨国公司利益的对立，强制供应链搬迁导致企业运营成本激增，反而削弱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二是单边施压策略与多极化趋势的悖论，各国为规避风险加速构建区域替代网络，客观上推动国际权力结构分散化。这些矛盾导致美国对华政策陷入“自我消耗”困境，短期施压效果与长期战略损耗形成反比关系。

四、应对特朗普政策冲击的对策

美国“新孤立主义”思潮的兴起既是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等趋势性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源于作为“守成大国”继续维持霸权地位的内在需求。美国“新孤立主义”并不会是短期现象，而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被持续推动的治理思潮。由于具体时代背景与现实问题的原因，美国的“新孤立主义”政策在实施内容与方式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传统孤立主义有着明显区别。

特朗普政府将国际秩序视为“零和博弈场”，认为既有国际机制未能有效维护美国利益优势，转而减少对全球事务的投入。这种调整既是对实力相对衰落的现实妥协，也包含重构规则主导权的战略意图。以此为指引，美国外交经济政策导向表现为一种保守主义的复归。“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制造业回流”“重构全球产业链”等都体现了这种价值理念的内在要求，其影响深远。对此，中国应积极应对，防止这些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一）保持战略定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

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的本质在于构建“体系化应对—结构性防御—主动性塑造”三位一体的国家利益维护机制。这种战略定力绝非被动防御的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对国家发展阶段、国际权力格局和战略博弈规律的深刻认知所建立的应对机制，其根本目标在于确保国家发展进程不被外部干扰打断，同时维护国际秩序演进方向的平衡性。战略定力的核心支撑源于对国家发展规律的清醒认知。中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经济体跨越的关键阶段，经济结构转型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交织推进，这决定了任何外部冲击的应对策略都必须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长周期目标。这种定力也反映在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的节奏把控上，确保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制度创新的动力而非阻力。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需要构建多维防御体系。在法理层面，必须强化国际法理据的体系化建设，通过完善国内法律域外适用机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重构，形成对单边制裁的规则制衡。在实践维度，应当建立“精准反制—弹性缓冲—韧性增强”的复合型应对机制：前者通过非对称手段对关键领域实施对等反制，中者依靠经济内循环能力消化外部冲击，后者通过科技创新突破构建战略安全屏障。这种防御体系的关键在于保持反应手段的可控性与可逆性，既彰显维护核心利益的坚定意志，又为外交斡旋预留弹性空间。在安全领域推动构建均衡有效的新型国家安全架构，在经济层面引领绿色数字经济规则创新，在科技领域布局下一代技术革命的制度性话语权。这种战略主动性的发挥，既能有效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又能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中国需要在坚守国家利益底线的同时，以更大的智慧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这既是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二）加强中国经济体系韧性建设，提升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

面对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新孤立主义”政策，中国应加强经济体系韧性建设，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升经济系统对外部冲击的缓冲能力、适应能力与修复能力。这种韧性建设本质上是重构经济循环的动态稳定性，关键在于形成内生增长动力与外部风险对冲机制的有机统一。经济韧性建设的首要任务在于强化内需驱动机制。第一，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壁垒，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市场的要素流通高速通道。加速国内市场整合与消费升级，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第二，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与消费环境优化激活消费潜能，使国内市场成为应对外部需求波动的稳定锚。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疏通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流动通道，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抗风险能力。第三，强化企业主体在技术创新与市场开拓中的主导作用，通过竞争机制筛选形成更具韧性的市场主体结构。这种市场自组织能力的增强，能够形成分散化、多样化的风险承载体系，避免产生系统性脆弱点。第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数字化转型形成新增长极，在传统要素成本优势弱化的背景下构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这种内生增长动力的培育，能够降低对外部技术路径与市场波动的依赖，形成抵御外部冲击的深层缓冲带。要构建“冲击识别—

缓冲吸收—结构优化”的闭环调节机制，使经济系统既能抵御短期波动冲击，又能通过持续的结构升级实现长期稳定发展。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的协同推进，中国可将外部遏制压力转化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在全球化重构进程中塑造更具韧性的发展范式。

（三）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增强规则适应能力与制度话语权

通过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国内监管体系与市场机制的现代化转型，在扩大开放中增强规则适应能力与制度话语权。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规则谈判筹码，推动国内规制体系与国际标准的有机衔接。面对技术民族主义抬头的趋势，中国需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抢占规则标准的制定先机。通过构建“基础规则兼容+新兴领域引领”的复合型规则体系，既保持与现行国际经贸机制的对话基础，又在新赛道建立制度性话语优势。这种战略的关键在于将技术标准、产业规范与经贸规则深度融合，使国内产业链升级与国际规则演进形成共振效应。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标准等领域探索差异化适配路径，既避免制度摩擦产生的市场准入壁垒，又为国内改革预留渐进调整的缓冲带。重点完善风险预警与压力测试机制，建立政策工具箱应对贸易摩擦、金融市场波动等各类冲击场景。这种规则层面的制度建设，能够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倒逼改革的动力，实现开放环境下的风险可控性。

（四）打破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单一依赖，构建弹性供应链体系

面对特朗普对华遏制政策，需打破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单一依赖，通过区域化布局与多元化替代构建弹性供应链体系。在技术封锁压力下，既要提升基础研发能力突破瓶颈制约，又要通过国际合作网络分散风险敞口。这种“自主可控+开放协作”的双轨模式，能够在保障供应链安全的同时避免陷入封闭式发展的效率陷阱，保持产业链的动态调整能力。构建“国内+海外”双生产基地，重塑全球供应链布局。引导企业向巩固国内生产基地的同时，在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区建立生产基地，既保持国际市场份额，又能通过国内市场消化过剩产能，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优化欧亚大陆供应链网络，提升中国企业全球资源调配能力。与友好国家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在半导体制造设备、量子计算等重要产业领域形成技术合作联盟。

（五）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改革，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的全球经贸新秩序

中国应尊重国际法的基础地位，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应对挑战，积极推动WTO实行有利于世界经济增长的改革，促使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民主和多极化方向转变。推动多边机制改革与区域合作创新双轨并进，既在WTO框架内倡导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诉求，又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经贸制度安排探索规则创新。在美国重拾“新孤立主义”日渐清晰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在经济全球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目前，经济全球化中的结构性弊端在于地区利益分配失衡和分割上。许多亚非拉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总是充当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地以及

制成品倾销地，这种角色多年来也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虽然涌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但其角色仍然停留在加工装配上，在产业链和增加值方面没有取得重要进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结构就是发展中国家无法突破发展瓶颈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应帮助有需要的世贸组织成员落实协定谈判成果，支持最不发达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提出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 140 多个国家和 80 多个国际组织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中国要坚持包容性的全球化道路，倡导多元开放包容，继续着力推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理念，强调与各国共同繁荣与发展，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的全球经贸新秩序。

Trump's Policy Resurgence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Order: A Neo-Isolationism Perspective

XU Chao¹, LI Tianguo²

(1.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entered on the core value of “America First”, demonstrates characteristics of selective strategic retrenchment and a neo-isolationist orientation. Through reconstructing its foreign economic strategy framework,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implemented policy measures including the unilateral imposition of punitive tariffs, strengthening of foreign investment screening mechanisms, and incentivizing industrial repatriation, thereby establish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marked by distinct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response to this policy regression, China should adopt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maintain strategic resolve to steadfastly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core interests; accelerat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y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its economic system to bolster its capacity to withstand external shocks; align with high-standar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to strengthen adaptability to these rules and bolster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power; break away from overdependence on single sources in critical supply chain links to build a resilient supply chain system; and actively engage in the reform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to adva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racterized by greater inclusivity, equity, and sustainability.

Key words: Trump; new isolationism;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orde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陈金刚, 彭秀银)